

## 文淵閣四庫本《文選》音注出自明翻六臣注本考\*

韓 丹

內容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六臣注文選》底本眾說不一，其所呈現出的顯著特點之一是注文中的李善音注大量刪減，或移入正文，或替換正文中的五臣音注。這種變化當源於明代潘惟時/惟德翻刻的六臣注本，並為吳勉學、崔孔昕、徐成位等刊本所繼承。通過對宋元到明清諸合注本中音注異文的訛誤軌跡分析，發現文淵閣本的音注形態多與潘、吳二本一致，而與崔、徐二本略有不同，後者可能曾據明代袁褧覆刻的六家本進行了校改，呈現出晚於文淵閣本底本的傾向。進一步結合清人目錄、纂輯等的相關記載，可知文淵閣本音注以吳勉學本為底本鈔錄的可能性最大。明確這一點，不僅有助於加深對明清兩代《文選》版本的認識，也有利於更加精準地使用《文選》四庫檢索資源，避免因底本判斷不確而導致的研究誤差。

關 鍵 詞：文選 四庫本 贛州本 明翻六臣本 音注演變

文淵閣《四庫全書》鈔錄的《文選》共有兩種，一種是李善注本，一種是六臣注本。前者底本為明代汲古閣本是學界公認的看法，後者底本則不明。《四庫提要》言其為明代袁褧<sup>1</sup>所覆廣都裴氏六家本。六家本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後的合注本，這顯與《四庫》實際所收的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的六臣本不合。我們將此本徑稱“文淵閣本”，其底本屬於六臣本系統是毋庸置疑的，但六臣本系統包括宋贛州本、宋建本、元茶陵本、明洪楸覆刻本以及一系列的明代翻刻本等，諸六臣本在版本流傳的過程中，不僅歷經修補，更有輾轉翻刻，其文本變化非常複雜，不能一以論之。理論上說，清代以前出現的六臣本作為文淵閣本底本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之前學界對文淵閣本的關注不多，所論者多以其底本為宋刻六臣本。如：傅剛提出《四庫》所收實際上是“南宋建州本（即《四部叢刊》影宋本）<sup>2</sup>”；范志新則認為“館鈔本所據贛州本”“其成書板刻必在（南宋）紹興癸酉年之前<sup>3</sup>”；王立群又明確指出“《四庫全書》收錄的《文選》六臣本為贛州本，《四部叢刊》收錄的為建州本<sup>4</sup>”；李佳通過對比贛州本與建州本，也得出“（四庫）薈要本和四庫本《六臣注

\* 本文為河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指導性計劃項目“日藏古鈔本所存《文選音決》研究”（2024-ZDJH-713）階段性研究成果，並得到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又，本文曾在“‘博物’傳統與人類‘新軸心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鄭州大學，2021年12月）上宣講。

<sup>1</sup> 《四庫提要》“此本為明袁褧所刊。朱彝尊《跋》，謂從宋崇寧五年，廣都裴氏本翻雕，諱字闕筆尚仍其旧，頗足亂真。”按：“褧”當為“褧”字之形訛，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2003年印，第1685頁。

<sup>2</sup> 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88頁。

<sup>3</sup> 范志新：《文選版本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sup>4</sup> 王立群：《文選版本注釋綜合研究》，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300頁。

文選》當俱以宋贛州本爲底本<sup>5</sup>”的結論。由於當今《四庫全書》影印本與電子本的易得，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便常常以文淵閣本直接作爲贛州本或建州本使用了。

我們在將《文選》諸鈔、刻本（包括單注本、合注本）中的音注窮盡式地錄入數據庫，並通過對各版本音注演變關係進行分析時，發現文淵閣本所存音注與傳世的宋贛州本、宋建本、元茶陵本等皆不同，卻與明代翻刻的六臣注本一致，具有明顯的《文選》晚期合注本的特征。就音注而言，從宋元刻本到清鈔本，《文選》六臣注的文本內部發生了大量的移位和替換，導致了文本性質上的雜糅與混合。<sup>6</sup>明確這個問題，可以更好地利用四庫的檢索資源，避免以晚期文本特征推測早期文本面貌的可能。劉鋒依據《四庫全書考證》所指出的底本訛誤提出四庫六臣本《文選》鈔自明翻六臣本<sup>7</sup>，恰可與我們從音注中看到的情況相印證。鑒於鈔本與刻本之間相互轉換的複雜性，本文僅據音注材料進行考察，以確定文淵閣四庫本《文選》音注的來源。

### 一、文淵閣底本絕非贛州本初刻本

贛州本是六臣注系統的祖本，此本傳世較多，如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及台灣“中央”圖書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日本靜嘉堂文庫等處均藏全本或殘帙，但這些版本皆爲宋元或宋元明遞修本，歷代公私書目所錄的贛州本也皆是遞修本。<sup>8</sup>范志新先生發現了文淵閣六臣注本與諸贛州遞修本之間的不同，並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一是“館臣當日鈔寫別有所本<sup>9</sup>”；二是“館臣所據贛州本爲早期刻本（或即初刻本），而傳世諸贛州本則爲後刻本<sup>10</sup>”。我們認同文淵閣本“別有所本”，但其底本爲贛州本初刻本之說，從宋代諸合注本音注合併的規律來看則不太可能。

據斯波六郎先生的研究，贛州本的底本“絕非單行的李善本和單行的五臣本”，而是在六家本的基礎上互易注文順序而來，<sup>11</sup>因而贛州本注文中的李善音因與正文中五臣音相複而刪情況當與六家本一脈相承。宋代諸合注本中的音注變化也證明了這一

<sup>5</sup> 李佳：《〈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薈要〉所收〈六臣注文選〉版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總第68期），第78頁。

<sup>6</sup> 筆者曾以《文選》音注最密集的前八卷爲例，考察李善音注在各版本中的位置移動與數量增刪，發現可將文淵閣四庫本作爲合注本《文選》音注演變的最後一環。參見拙作《李善音注的版本演變——從敦煌本到胡刻本》，曾於2018年第十三屆《文選》學年會上宣講，後收入《百年選學：回顧與展望》會議論集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715-724頁。

<sup>7</sup> 劉鋒：《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六臣注文選〉底本考辨》，《中國典籍與文化》，2021年1期，第18-22頁。

<sup>8</sup> 關於諸贛州遞修本的目錄著述及收藏情況，詳參劉明《宋贛州本〈文選〉遞藏源流考》，《文津學志》，2010年，第86-95頁。

<sup>9</sup> 范志新：《文選版本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頁。

<sup>10</sup> 范志新：《文選版本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sup>11</sup> [日]斯波六郎著，李慶譯：《文選諸本研究》，《文選索引》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70頁。

點，顯示出了清晰的從六家本到六臣本漸次加深的演變脈絡。<sup>12</sup>茲擇兩卷為例，以音注數量列表說明這種傾向。

表1

		宋刻本				元刻本	清鈔本
		秀州本	明州本	贛州本	建州本	茶陵本	文淵閣本
卷一	正文	433	433	430	431	431	439
二	注文	172	171	177	177	175	22
卷三	正文	418	415	412	412	412	429
四	注文	215	172	146	146	146	39

從表1可知，宮內廳所藏贛州本（宋元遞修本）中所存音注的數量與秀州本、明州本略有不同，而與建州本、茶陵本完全一致，而文淵閣本中的音注數量則異於諸宋元刻本，其表現是正文音少有增加而注文音大量刪減。從這一點來說，贛州本遞修本顯然早於文淵閣本的底本，因為已經刪除的音注是很難無緣無故的復原並被其後刻的建州本、茶陵本繼承的。

事實上，《文選》李善音注在合注本中被刪略的情況，在秀州本合併伊始就發生了。今見奎章閣本後附秀州州學《跋》文稱“二家注無詳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備錄無遺。其間文意重疊相同者，輒省去留一家”，對於兩家音注的重疊，《跋》文中雖未言明如何處理，但音復而刪的情況確實是存在的。比如卷二《西京賦》與北宋國子監殘本同出的篇幅中，奎章閣本存注文音163個，而監本則為315個，將近半數的李善音注因與正文中的五臣音注重疊而省略，可以說“音復刪重”是音注合併時的一大原則。但是從我們對奎章閣本中兩家音注的統計分析結果來看，其所代表的秀州本中音注合併的深度並不平衡，而且各卷的情況也有不同，有的僅音注字面相同的才刪，有的則不拘字面只要所切之音相同即刪，有的即使切字全同也未刪，這種情況造成了秀州本之後的合注本存在進一步音注合併的空間。

我們選取卷二與卷四為例，代表了合注本音注演變的兩種傾向：基本穩定（卷二）和漸次刪重（卷四）。這兩種傾向反映在贛州本中，則突出地表現為兩點：一是因贛州本李善注文“已見復出”所導致的增音（卷二），一是在明州本的基礎上再度刪重而造成的李善音注的遞減（卷四）。但文淵閣本則不僅是刪略音同的李善音注，還出現了大量的李善音注移入正文，甚至是替換正文中的五臣音注的情況，這在明代以前的諸宋元刻本中均未出現。文淵閣本這種雜糅式的合併是不可逆的，因此其底本絕不可能是贛州本的初刻本。

<sup>12</sup> 本文使用的所有音注數據均是由筆者自建《文選》版本數據庫統計得來，主要依據的版本是秀州本（朝鮮翻刻的奎章閣本，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廣都裴氏本（明代袁褰覆刻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州本（日本足利學校藏，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以上三本為六家本；贛州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建州本（四部叢刊本，中華書局，2012年）、茶陵本（古迂書院刊本，台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以上三本為六臣本；潘惟時/惟德本（國家圖書館藏）、吳勉學本（長春圖書館藏）、崔孔昕本（國家圖書館藏）、徐成位本（國家圖書館藏），以上四本為明翻六臣本。

## 二、文淵閣本與諸明翻六臣本音注分佈一致

最早提出明翻六臣本中存在音注變化的是斯波六郎先生，他在對明代崔孔昕本考察時發現“茶陵本李善注中的音釋，此本往往刪削之，移往正文文字之下”，但未進一步深究<sup>13</sup>。而對於文淵閣本中的這種音注變化至今未見有人提及，我們將文淵閣本與崔孔昕本對比，發現其音注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因此推測館臣可能鈔自明翻六臣本。

明代所刻的六臣本包括兩個系列，一種是覆刻本，以洪楸本為代表。洪楸本不僅行款與茶陵本同為半葉10行18字，誤字亦同<sup>14</sup>，其音注也是與茶陵本一脈相承的。另一種是翻刻本，以潘惟時/惟德本、吳勉學本、崔孔昕本、徐成位本為代表（以下皆用簡稱），四本皆半葉9行18字，各葉起迄文字等亦無別，僅板式略有不同，紙質與刻工亦有差異，可見其兩兩相承的關係<sup>15</sup>，但四本在音注數量上均與文淵閣本一致。如表2所示，清代四庫鈔本包括文淵閣本與薈要本所反映的音注數量的變化顯然是以明代翻刻六臣本為起點的。

表2

		清鈔本		明翻本				明覆本	元刻本
		文淵閣本	薈要本	潘本	吳本	崔本	徐本	洪楸本	茶陵本
卷	正文	439	439	439	439	439	439	431	431
二	注文	22	22	22	22	22	22	175	175
卷	正文	429	429	429	429	429	429	412	412
四	注文	39	39	39	39	39	39	146	146

關於明翻六臣本的刊刻次序及淵源，斯波先生以崔、徐本置於潘、吳本之前，然因其未見潘本全帙，有闕疑之慮<sup>16</sup>；范志新先生則據版式、刻工、紙質、題跋等因素判定潘本、吳本為嘉靖年間所刻，早於萬曆二年的崔本與萬曆六年重刻的徐本。<sup>17</sup>我們認同范先生的觀點，以潘本為明翻六臣本的祖本。為免繁瑣，今僅將文淵閣本所反映的音注變化與潘本相比較，其餘三本則因與潘本一致而從略。下面仍以卷二、卷四為例，具體考察從茶陵本到潘本及文淵閣本的音注變化。

<sup>13</sup> 李慶譯，斯波六郎著：《文選諸本研究》第101頁，《文選索引》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sup>14</sup> 李慶譯，斯波六郎著：《文選諸本研究》第91—96頁，《文選索引》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sup>15</sup> 此四本皆為安徽新安刻本，其中潘本、吳本板式為左右雙邊，刻工名多從“王”，所用為白棉紙，而崔本、徐本板式為四周雙邊，刻工名多從“金”，所用為竹紙。參見范志新《崔本、吳本與潘本的傳遞關係》，《文選版本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5—136頁。

<sup>16</sup> 李慶譯，斯波六郎著：《文選諸本研究》，《文選索引》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sup>17</sup> 范志新：《〈六臣注文選〉吳勉學本出潘本》，《文學遺產》，2000年第4期；《文選版本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5頁。

經統計兩卷中茶陵本共存音注947條，潘本餘917條，似乎只是略微減少，這與我們的計數方式有關。由於合注本的特殊性，常常出現五臣與李善兩家共注一字的情況，我們稱之為“正注同出”。對於此類情況的處理方式是無論音注同否，皆計為一條，如：“嶮，宜檢/魚儉<sup>18</sup>”，五臣音“宜檢反”，李善音“魚儉切”。宋刻本中的音復而刪一般僅出現在這種一字二音的情況下，其結果是刪減了一家音注但沒有減少“注音節點（被注字）”，而潘本刪減音注的情況則更為複雜。因而具體的音注變化還需要按僅正文音、僅注文音與正注同出三種類型分別考察，詳見下表：

表3

	僅正文音	正注同出	僅注文音	總計
茶陵本	624	219	104	947
潘本	856	12	49	917
刪略注文	4	2+2+199	24	268
移入正文	0	4	31+2	37

由表3可知，經過諸宋刻本的合併刪複，茶陵本中的音注已經主要集中在正文中，但還有219條正注同出的情況，而潘本中則僅餘12條，其中2條刪了正文音而保留了注文音（湍，專/鹿搏；滂，普郎/普忙），2條正注皆刪（澥，解/蟹；蠱，也/古），其餘199條皆刪去了注文中的李善音而保留了正文中的五臣音。同時，潘本注文中的音注在沒有正文音的情況下也大量減少，僅餘不足半數，這就無法用合併刪複來解釋了，而潘本中僅存於正文的音注又大量增加。這種情況指引我們進一步詳細分析，發現潘本中伴隨著音注刪減的同時出現了音注移位的現象。在沒有正文音干擾的情況下，從茶陵本到潘本減少的55條李善注文音中，有31條移入正文，佔據了本應該屬於五臣音的位置，這種李善音移入正文的情況在宋元各本中也有，但只是零星出現；而另外24條則不因與正文音注重複而徑刪，這種李善音無故被刪的情況在宋元刻本中是很罕見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正注同出的情況下，注文中的李善音移入正文的結果就是直接替換正文中的五臣音。雖然在這兩卷中只有4例，卻代表了一種新的合併類型，故詳列材料如下。

表4

	六家本	六臣本	明翻六臣本 <sup>19</sup>	出處
互	乎故/胡故	乎故/互	互/0	西京賦
騷	渠迫/逵	——	逵/0	西京賦
絪	胡卦/卦	——	卦/0	西京賦
氏	丁禮/旨	——	旨/0	三都賦

\*本文表格皆以左側相鄰一列為基點，右側音注如與左側全同，則省略為“——”，下同。

<sup>18</sup> 由於《文選》合注本中正文注文兩處皆存音注之故，本文以“正文音/注文音”的形式列舉，如僅存一家，則表示為“0/注文音”或“正文音/0”。簡明起見，各音注均省略術語，單字為直音“（音）某”，雙字為反切“某某（反/切）”，下同。

<sup>19</sup> 本文所言六家本包括奎章閣本、袁本、明州本，六臣本包括贛州本、建州本、茶陵本，明翻六臣本包括潘惟時/惟德本、吳勉學本、崔孔昕本、徐成位本，下同。



由上表可見，明翻六臣本是在宋元所刻六臣本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如“互”六家本李善注“胡故切”反映了北宋監本的原貌，“音互”首次出現在贛州本中不知何據，明翻六臣本又將此音移入正文，顯示出了清晰的版本演變脈絡<sup>20</sup>。

總之，注文音的刪減、移位和置換，就是上述潘本比茶陵本增加了232個（199+37-4）“僅正文音”（正文有音注，注文無音注）的直接原因。這些僅在正文中出現的音注不全是五臣音，李善音來源的約佔18%（35/199），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此時合注本中的音注位置已經不能作為區分李善與五臣兩家音注的標準了。這種音注深度合併的情況在宋元各本中均未見，明翻六臣本呈現出的雜糅的特征，決定了其文本只能是晚期的整理本，因為刪除過的音注無法復原，混淆後的音注亦無從剝離。而文淵閣本的音注數量與移位情況與潘本完全一致，可知其底本不會早於茶陵本。

### 三、文淵閣本與諸明翻六臣本音注特征一致

與宋元諸合注本相比，文淵閣本的音注特征明顯與明翻六臣本更為一致，顯示出同刪、同增（正文音增加的來源主要是原注文音，或稱“移位”）、同改、同訛的高度一致。就音注刪略而言，如表3所示明翻六臣本主要集中在注文音中，正文音也有少量被刪的情況，考文淵閣本被刪的268條正注文音注與明翻本完全一致，為避繁瑣，例證從略。下面以音注移位為證，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在卷二與卷四中，潘本正文相對於茶陵本添入了33條音注，其中30條均在六家本與六臣本的李善注中，而文淵閣本、薈要本、明翻六臣本則移入正文字下且沒有任何改動，如：（卷二）褊，卑緬；墜，都亘；麗，力氏；衍，以善；瞿，巨駒；蜃，腎；蟾，昌彥；蜎，市井；（卷四）嶇，丘隅；藹，之餘；薪，析；莫，冥；蠱，聿連；羶，尸然；醞，於問；狎，胡甲；被，皮義；齊，在雞；睇，徒計；扃，古焚；梧，忤；熾，昌志；瀛，盈；鵠，徒兮；鵠，胡；桃，光；榔，郎；皀，胡了切；蟻，蟻；酤，戶。另外2條並非李善音來源，其中1條與五臣音同（“袤，茂/0”，六臣本為“0/莫又”，六家本為“茂/莫又”），1條則不知何據（“老/0”，六臣本為“0/梁道”，六家本無音注），但文淵閣本與薈要本均與明翻六臣本同，而不與宋元諸本同。還有1條注文音在移入正文時產生了訛誤，而這個訛誤也保存在了文淵閣本與薈要本中。此條為卷二《西京賦》“昭藐流眄，一顧傾城”，宋元各本注文皆有“昭，亡井切”，明翻六臣本則在正文“昭”字下夾注“亡井”。按：昭藐，薛綜注曰：“昭，眉睫之間。藐，好視容也。”《廣韻》“昭”在上聲靜韻“亡井切”注“昭晴”，與薛綜舊音“亡井切”同。因《集韻》“昭”有“彌并切”一讀，明翻本切下字為“并”字或非單純的形近致訛，也可能是據時音而改，檢文淵閣本與薈要本與潘本同為“亡并”。

<sup>20</sup> 另外潘本注文中保留的音注也有類似情況，如“鵠”贛州本始添入“音栝”的注文音，潘本與六臣本同。

另外，音注在版本變化中的同訛或同改，大概更能說明兩種四庫本與明翻本的關係，以考察其文本差異產生的來龍去脈，並通過訛變軌跡探求贛州本系列諸六臣本的親疏。由於此類材料較多，僅擇卷二與卷四中的典型例證列入下表：

表5

		贛州本	建州本	茶陵本	潘本	文淵閣本	荟要本	出處	备注 <sup>21</sup>
A	縱	七松	——	——	土松	——	——	西京賦	訛
	駢	俟	——	——	矣	——	——	西京賦	*訛
	蛇	逸斯	——	——	逸期	——	——	南都賦	*訛
	獲	護	——	——	戶	——	——	南都賦	改
B		雅札	——	雅礼	雅禮	——	——	南都賦	訛
	銛	息兼	——	息廉	——	——	——	西京賦	*訛
	瀟	想胤	——	自吝切	自吝	——	——	南都賦	改
	漻	了	——	鹿	——	——	——	西京賦	改
C	鋸	苦兩	居兩	居兩	居兩	——	——	蜀都賦	改
D	售	常呪反	——	常呪切	——	——	——	西京賦	*改
	蜎	於雲反	於雲切	——	——	——	——	西京賦	*改
	躑	星田反	星田切	——	——	——	——	南都賦	*改

由上表可見，文淵閣本所呈現的音注訛變與改動，不少是從潘本才開始出現的（A組），也有茶陵本、建州本就已經改動，而潘本繼承其變化的（B、D組），也有將訛誤改回的情況（C組）。從文本演變來看，文淵閣本與潘本完全一致，而潘本則與六臣本中的茶陵本更為接近。最典型的例證是“鷗”字，檢宋刻六家本與六臣本均作“雅札”，元茶陵本切下字“札”形近訛為“礼”字，明翻六臣本又繁化為“禮”。“礼”為“禮”之古字，茶陵本有慣用“礼”字的傾向，如：觥，各本皆注“丁禮”，僅茶陵本作“丁礼”。如果不考察茶陵本，就很難理解為何明翻六臣本和清鈔本會將“札”字訛為“禮”。因此從音注的文本特征上來看，文淵閣本不僅與明翻六臣本完全相合，而且與元茶陵本、宋建州本、宋贛州本存在由近到遠的“血緣”關係，顯示出清晰的遺傳與突變的脈絡。

#### 四、文淵閣本音注據明吳勉學本所鈔的可能性最大

那麼，文淵閣本的音注來源到底是不是今見四種明翻六臣本之一，還是另有所本呢？從上文所考音注數量和分佈特征來看，其出自明翻諸六臣本都是有可能的，但如結合音注異文、目錄記載等材料，則可推知其以吳勉學本為底本鈔錄的可能性最大。原因如下：

<sup>21</sup> 本文重點在於對比各本的音注演變軌跡，關於對各音注訛誤或改動的考證，限於篇幅，暫不敷敘，僅將結論列於表中，標記體例如下：“訛”指因形近產生訛誤，所注之音亦訛；“\*訛”指隨著語音的時代演變，音切雖形近而訛但所注之音未訛；“改”指據時音而改；“\*改”指無意的改動，如北宋以後刻本中的改反為切多是根據使用音注術語的習慣，並非刻意為之，卻可藉考察版本的源流。可詳參拙作《也談改“反”為“切”——以〈文選〉諸版本音注術語的演變為切入點》，《漢語史學報》，2020年2期。

第一，從音注異文上看，文淵閣本屬明翻六臣本中的潘-吳本系統，而非崔-徐本系統。上文已述明翻六臣本可分為兩組，吳勉學本承潘惟時/惟德本而來，而徐成位本之《序》則明言是在崔孔昕本的基礎上校改的。就異文而言，崔-徐本對潘-吳本中的訛誤做了不少校改整理，而文淵閣本與薈要本則與潘-吳本同訛，因而顯然不是據崔-徐本鈔錄的。茲將兩卷中文淵閣本與崔-徐本有異的音注悉列入下表，以考察宋元刻本到文淵閣本的訛誤軌跡及崔徐本的校改來源。

表6

		秀州本	明州本	贛州本	茶陵本	潘-吳本	文淵閣本	薈要本	崔-徐本
A	爚	音藥	—	—	音樂	—	—	—	音藥
	獫	呂驗	—	—	昌驗	—	—	—	呂驗
B1	錯	苦駭	—	—	—	若駭	—	—	苦駭
	巖	許亘	—	—	—	許亘	—	—	許亘
	猱	奴刀	—	—	—	如刀	—	—	奴刀
	婁	伊遙	—	—	—	伊搖	—	—	伊搖
B2	氏	丁禮	—	—	—	旨	—	旨	—
	獠	力召	—	—	—	力石	—	力召	—
C1	玃	弋狩	—	戈狩	—	戈符	—	—	弋狩
C2	鵬	匹眇	正眇	—	—	正眇	—	—	匹眇
	梗	頻綿	頻縣	—	—	—	—	—	頻縣

上表為我們清晰地描繪了從初次合併的秀州本到兩種明翻六臣本的演變歷程，具體來說有以下3點啟示：

（1）部分僅在茶陵本中出現的訛誤保存在潘-吳本中（A組），當然不少茶陵本中出現的訛誤潘-吳本已做校正，但至少說明明翻六臣本與茶陵本的關係是最為接近的，也可證上文選取茶陵本與潘本做音注分佈的數據比較是有據可依的。

（2）文淵閣本與僅在潘-吳本中出現的訛誤完全一致（B1組、C組），而且文淵閣本似乎比薈要本更接近潘-吳本（B2組），如：“旨”與“旨”，“力石”與“力召”之別。相同的例子還有卷四“其草則有薦苧蘋莞，蔣蒲葦葭”句，“莞”字下有“桓”的注音，文淵閣本同吳本“桓”字缺末筆，薈要本則不缺。當然，這也可能是四庫鈔錄者的習慣寫法等導致的，但至少說明文淵閣本確是從潘-吳本鈔錄而來的。

（3）崔-徐本校改主要針對潘-吳本中的訛誤，如：卷二“奎踣盤桓”句，各本“踣”字均音“羌睽切”，但六家本校語為“踣，善本作奎”，六臣本作“奎，五臣本作踣”，潘-吳本訛為“奎，五臣本作跨”崔-徐本則改回“奎，五臣本作踣”。值得注意的是，其校改結果是不僅避免了六臣本中的各種訛誤直接與六家本一致（C1組），甚至改回明州本之前的音注原貌，因而我們推測崔-徐本的參校本有明代袁褧覆刻的北宋廣都裴氏本（C2組）。略舉兩例如下：I. 卷四《蜀都賦》“梗柟幽藹於谷底”句，“梗”正文字下注“頻綿”，檢五臣注南宋陳八郎本、明朝鮮正德本與六家注奎章閣本同，可知五臣音確為“頻綿”，此當為秀州本原貌，北宋裴氏本（袁本）“綿”變為異體字“縣”，明州本“縣”字又形近訛為“縣”，“頻縣”遂為之



後的贛州本等諸六臣本所繼承。按：“梗”音“頻綿”在仙韻與《廣韻》“房連切”同，“頻縣”則在先韻，蓋宋代仙先二韻已併，明州本雖形訛但音不訛，故此後諸本均承之。崔-徐本在不改變讀音的基礎上，改回僅見於裴氏本“頻縣”，很有可能是參校了袁本。諸本訛改軌跡為：

奎章閣本	>	袁褰本	>	明州本、贛州本、潘-吳本	>	崔-徐本
頻綿	>	<u>頻縣</u>	>	頻縣	>	<u>頻縣</u>

Ⅱ. 同卷“觴以清醪”句，“醪”秀州本、裴氏本作“匹眇”，明州本始訛為“正眇”，潘-吳本則因刻本中“目”旁與“耳”形近進一步訛為“正眇”，崔-徐本則作“匹眇”。崔-徐本中的這個音注既保存了潘-吳本的訛誤痕跡，又顯示出了據袁本（裴氏本）校改的傾向，而所有的這些訛誤，文淵閣本皆未改動，顯非崔-徐本來源。諸本訛改軌跡為：

奎章閣本、袁褰本	>	明州本、贛州本	>	潘-吳本	>	崔-徐本
<u>匹眇</u>	>	正眇	>	正眇	>	<u>匹眇</u>

第二，《四庫》編纂時所見《文選》似均為明刻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文選注》六十卷”“《六臣注文選》六十卷”皆言“內府藏本”，其中李善本為明汲古閣本、而六臣注本《提要》則稱“此本為明袁褰所刊”乃“據廣都裴氏本翻雕”，又與“明田汝成重刊”本（洪梗本）及“萬曆戊寅徐成位所刻”本相較，所提及者皆明刻本。<sup>22</sup>《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稱“今依內府所藏明吳勉學刊本繕錄，據明槧本、袁褰本恭校”。<sup>23</sup>雖然《天祿琳琅書目》記錄宮內存有趙孟頫等跋文的宋刻贛州本，但似乎館臣並未得見，當時內府所收《文選》仍是以明代刻本為主的。

第三，《四庫薈要》是在《四庫全書》編纂期間“擷其菁華，繕為薈要”的，從情理上講，薈要本與文淵閣本所據《六臣注文選》為同一種的可能性最大，同時從對實際文本特征的考察來看，文淵閣本與薈要本音注的分佈情況一致（見表2），顯然鈔自同一底本。那麼既然薈要本《提要》言其鈔自吳勉學本，文淵閣本的音注就很有可能也是以吳本，而非其他三種明翻本為底本了。另外細讀兩種《提要》均涉及袁本，只是薈要本《提要》明確指出袁本、明槧本為參校本，而四庫本《提要》則以袁本為底本，但前後又言及田氏本，有語焉不詳之處，疑其所述有訛，或亦指以袁本與田氏本（明槧本）參校，猶未可知。

<sup>22</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2003年印，第1685頁

<sup>23</sup> 江慶柏等整理：《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439頁。

綜上，文淵閣本音注出自明代吳勉學本的可能性最大。檢清人書目記載，潘本、吳本並不多見，如：《天祿琳琅》諸書目僅載崔-徐本<sup>24</sup>；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亦僅載崔本；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載崔孔昕本、洪楨本，又言“六臣注又有新安潘維時、維德校刊本，未見”；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對四本皆有記錄，但言潘本爲三十卷本，疑有訛誤，或據他本鈔錄。今人傅增湘的《藏園群書經眼錄》記載了崔本、徐本及潘本，未見吳本<sup>25</sup>。斯波六郎在《文選版本研究》中則稱未見潘本，僅得一卷嗣後詳考，又稱和刻本中的慶安本是以吳勉學本爲底本翻刻的<sup>26</sup>，蓋因其不得潘本核查之故。我們詳細對比了國圖所藏的潘惟時/惟德本與長春圖書館所藏的吳勉學本，發現不少頁面連刻工都相同，疑明代大刻書家吳勉學曾得徽州同鄉潘惟時/惟德之板，後僅對某些板面進行了重刻或挖補，多數則直就原板印刻，包括卷首的“吳勉學刻”亦可辨出剝改“潘惟時/惟德刻”的痕跡。

故而，我們認爲詳細區分文淵閣本的底本究竟是潘本還是吳本的意義並不大，具體到音注方面，兩本更是幾乎沒有差異，可以採取統稱其底本爲潘-吳本的方式。另外，相對於崔-徐本來說，文淵閣本與其音注分佈的情況是一致的，異文也主要是對潘-吳本訛誤的校改。因此，渾言之，稱文淵閣四庫本《文選》音注出自明翻六臣本即可。

## 結 論

本文通過對文淵閣本音注及其底本的考察，有以下幾條發現：

1. 文淵閣本雖爲六臣注本，但距離宋刻贛州本已有較大變動，特別是音注存在大量的刪減、移位和替換的現象。
2. 爲方便誦讀，僅擇一家之音，使得明翻六臣本具有突出的雜糅性質，音注位置不再是區分李善、五臣兩家的標誌，反映了明代李善與五臣兩家文本界限的模糊以及合併刪復原則的深化。這種音注的混淆顯然只能是晚期版本的特征，而且是不可逆的。
3. 文淵閣本與明翻六臣本的音注在數量、分佈、刪改、訛誤等方面均顯示了高度的一致性，結合目錄、纂輯等記載，可推知文淵閣本音注出自吳勉學本的可能性最大。
4. 對於徽刻明翻六臣本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從訛誤校改的軌跡來看，崔-徐本確當在潘-吳本之後，可能是參校袁褱覆刻裴氏本改正的，總體上呈現出比文淵閣本底本更晚的文本面貌。

目前明清《文選》學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人的平點與清人的考證之類，明清版本相

<sup>24</sup> 關於“明版集部”的目錄記載有《天祿琳琅書目》袁褱刻本十部，六臣注一部；《天祿琳琅書目續目》袁褱刻本四部，萬曆崔孔昕刻六臣注本一部；《天祿琳琅現存書目》袁褱刻本兩部，萬曆二年崔孔昕刻、萬曆六年徐成位重校本一部；《天祿琳琅錄外書目》袁褱刻本四部，洪楨本一部，崔孔昕本兩部，未知一部。參見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4-24頁。

<sup>25</sup> 劉志偉主編，劉鋒、王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卷》，中華書局，2019年，第315、356、327、423-424頁。

<sup>26</sup> 李慶譯，斯波六郎著：《文選版本研究》，《文選索引》第一冊，第105、107頁。

對於宋元版本的文本變化則較少有人涉足。《四庫提要》言“田氏刊本，頗有刪改，猶明人竄亂古書之習”<sup>27</sup>，這實際上是明代《文選》版本的共同特征。明翻六臣本中音注變遷所反映的文本演變規律及背後動因，很可能反映了明人對李善與五臣兩家注本的真實看法。而明翻六臣本中的音注通過被鈔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方式，在清代初期取得了官方定本的地位，進一步影響到了清代《文選》學研究的某些觀念。關於此問題，我們將另文詳述。

（かん たん、鄭州師範學院文學院講師）  
（広島大学人間社会科学研究科客座研究員）

---

<sup>27</sup>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2003年印，第1685頁。

# ***Wenxuan's Pronunciation Annotation Notes by Six Ministers of Complete Library of Wen Yuange's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Com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Version of Wenxuan by Six Ministers***

Dan HAN

**Key Words:** *Wenxuan*; the edition of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the edition of Ganzhou; the Ming Dynasty version of *Wenxuan's Notes by Six Minist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onetic Notes

Abstract: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Wenxuan's Notes by Six Ministers* in the Wen Yuange's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is diverse and confused. In this copy, the pronunciation annotation made by Li Shan is mostly deleted or moved into text to replace the other five minister's pronunciation annotation. These variations started when Pan Weishi or Weide reprinted the book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later passed on by the Wu Mianxue's Edition, Cui Kongxi's Edition and Xu Chengwei's Edition. According to the rectification way of phonetic notation in various editions of *Wenxuan's Notes by Six Ministers* from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pronunciation annotation form of Wen Yuange's edition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editions of Pan's and Wu's, yet differ from Cui's edition and Xu's edition.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editions of Cui's and Xu's were probably based on a particular rectification by the editions of Yuanjiong, which presented as more advanced than the original text of Wen Yuange's edition. Besides, given the relevant records such as the catalogue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Qing Dynasty and modern textual research, it's known that the pronunciation annotation of Wen Yuange's edition was most likely taking Wu Mianxue's edition as its original text. To clarify this, it will not only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version of *Wenxu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also help to make more accurately use of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s* databases retrieval resources of *Wenxuan* to avoid the research errors caused by incorrect judgment of the original copy.